

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 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学习邓小平教育思想的一点体会

李 进 才

本文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一重要论述的一些体会。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我国教育发展指导方针深刻转变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同时,邓小平同志从这一思想出发,从全新的角度,深刻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学说的重大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还由此提出了我国教育要不要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的问题,从根本上指明了教育改革的前进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一复出工作开始,就高瞻远瞩地从抓科学、教育入手,大力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问题有一系列英明论断,这些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我们至今学习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而又极其深刻,因此,应当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

教育发展指导方针的转变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关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思想,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其内涵极为丰富和深刻,对我国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科学地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教育指导方针的深刻转变。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自50年代后期,即“大跃进”时期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以来,就长期被蒙上了“左”的思想的影响,而到文化大革命中,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这一方针在实质上已被扭曲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教育自阶级社会以来所固有的阶级性和社会性,被曲解为只有阶级性,因此,教育也就被当作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工具论”困扰教育多年,使教育蒙受惨重损失,成为“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本清源,在教育领域逐步肃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流毒。“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正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

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转变,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指导方针、指导思想的最根本的转变。它不仅剔除了“左”的思想对教育指导方针的影响,而且明确和肯定了教育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建设与发展这一根本指导方针。完成这一转变,的确来之不易,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两个提法是相同还是有差别呢?应当说,这两个提法是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同点是,两者同是隶属于教育的外部规律范畴,即教育同社会的关系的规律;两者都强调了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故两个提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不同点有二,其一为:后者强调了“服务”,前者在强调“服务”的同时,还强调了“受制约”,其含义要宽一些。据潘懋元教授研究,“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适应这个词……一个方面是‘受制约’,一个方面是‘为之服务’。因此,这条规律可稍加引伸,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①;其二为:后者所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包含的范围宽一些,前者则强调了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范围似乎窄一些,但重点更突出一些。

其次,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突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党中央确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非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等新情况外,都要一心一意抓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各行各业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工作,作为战略重点的教育当然不能例外。邓小平同志关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论述,说明教育不是部分可以与之相适应,部分可以不与之相适应,而是各级各类教育都要与之相适应;不是可以与之相适应,也可以不与之相适应,而是必须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百分之百的体现。当然,作为教育自身来说,它有多种功能,既要服务于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还包含和预示着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教育春天的到来。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年就曾预见:“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②。教育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所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教育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直至党的十四大,仍然强调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重视教育,已逐渐成为举国上下的一种共识。当今,一个科教兴国、科教兴省(市)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尽管目前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还存在种种困难,但我们深信,伴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必将得到迅速发展并出现高潮。现在有人预见这个高潮将出现在本世纪末,也有人预见将出现在下世纪初或下世纪中叶,但不管怎样,这个高潮一定会到来,只是迟早的问题。教育兴国、兴省(市)与国兴教育、省(市)兴教育是双向的。这也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说的重大继承和发展

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思想出发,邓小平同志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都一贯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这是改造社会的强有力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建国以后,在我国的教育事业中也在努力实践这些学说,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特别是后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学说受到严重的扭曲、破坏。劳动教育变成了“劳动惩罚”,“全面发展的新人”被篡改成了“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破坏极为猖獗,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批判了他们的种种谬论,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并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呢?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在许多方面对这一学说作了重大继承和发展。

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在新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要求。列宁在《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指出:“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③。列宁在这里深刻揭示出了教育和教学如果与生产劳动相脱离所存在的严重后果,即“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也就是说教育事业所培养的人才和出的成果在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方面达不到时代要求的高度。理所当然,这样的教育事业只能是不成功的乃至是失败的教育事业。但为什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呢?或者说,为什么真正做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能达到上述方面所要求的高度呢?列宁尚未来得及回答,邓小平同志则深刻地揭示出这一内在的要求和规律,那就是“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高新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有如雨后春笋。未来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高速度高效益的有机结合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④。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人才的竞争,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度、高效益,必然要求教育的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率。也就是说,要求培养人才的教育,在质量上、效率上必须迅速提高,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怎样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定要考虑到如何能够迅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四人帮”打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幌子,所推行的把知识分子赶下乡去实施劳动惩罚,鼓吹所谓“开门办学”实则是只开门不办学,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作法,不仅包藏了反革命的祸心,而且搞的是列宁所批判过的“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说的根本背叛。“文化大革命”到头来只能是革了文化和教育的命,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和文教事业濒临破产。他们的倒行逆施,与迅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进一步扩大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涵,并使之更加具体化、科学化。首先,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放到“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背景下来考察。“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⑤很显然,“四人帮”所搞的脱离所学专业 and 将来从事职业参加劳动的那一套,正是邓小平同志所尖锐批评的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貌似革命,实际上是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破坏。其次,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不断开辟新途径,增加新行业,作为教育就要适应这种形势,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增设新的学科专业。近年来随着国家高新技术、第三产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我国广大高校不断增设高新技术型、外向型、第三产业型的学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就是邓小平同志指示的具体贯彻的结果。再次,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②。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同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一样,都要纳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轨道,而且还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发展趋势,从而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和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三是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要有新的发展。因为在这方面被“四人帮”弄得非常混乱,所以邓小平同志有一系列论述来进行拨乱反正。在“四人帮”看来,只有简单劳动才算劳动,复杂的劳动、有技术的劳动不算劳动,科学试验更是与劳动无缘。还有,在他们看来,只有集中的劳动才算劳动,分散的劳动不算劳动,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的劳动不算劳动,即所谓“要专业对口首先要思想对口”等等,形而上学猖獗到了极点。不可否认,参加一些一般性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对于学生接触工农、了解国情、提高思想素质是有好处的,但仅仅是这样也是不够的。当今,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激光、超导、核能、基因重组等现代技术作为物质微观运动的应用,已不可能再来自工匠们的直观经验,而只能源于科学研究中发现新的机理”^③。因此,大学生应当主要参加与专业对口的劳动和科学实验。而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科学知识迅速更新,又要求学生的学习具有连续性、系统性,不可违背教育规律,随意中断。邓小平同志为此大声疾呼,作了一系列指示并采取措施严厉批驳“四人帮”的谬论。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当机立断,决定恢复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邓小平同志说:“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④。针对“四人帮”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⑤。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也应当考虑怎样有新的突破。邓小平同志说:“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⑥,并且强调更重要的是使整个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指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继承和发展,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它对教育、教学改革已经并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及影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还只是进行了一些探索,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对于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和总结,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系列指示需要继续加深学习和领会,在不断研究新情况、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开拓前进。

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进军号角

我国教育要不要深化改革,怎样深化改革,邓小平同志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思想出发,从根本上指出了教育改革的前进方向。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教育则是其基础。但作为现代化基础的教育,是否会天然地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须进行改革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教育与社

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过程之中,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长期与高度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我国教育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转轨”性变革。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这个问题时,没有作一般性的号召,而是十分朴实并极其深刻地提出了改革的战略方针、目标以及改革的主要内容,从而真正吹响了教育改革的进军号角。

教育改革的战略方针、目标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换言之,就是要使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教育不只是其中的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应当是“有机”的,水乳交融的。众所周知,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当代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要求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还远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两者之间既有相适应的部分,更有许多还不适应的部分。因此,必须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要改革那些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部分。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而具体的描绘了我国教育改革的宏伟蓝图。这是一项极其光荣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对于这个奋斗的航向,邓小平同志早在70年代就已明确指出。如果说,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那么,要“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我国教育发展、改革的指导方针,同样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只不过这个“计划”,不是狭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的“计划”罢了。

邓小平同志在高瞻远瞩地提出教育改革的战略方针和目标的同时,又在当时整个教育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下,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教育改革的一些主要内容。他要求应当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以及建立新的学科专业,以适应国家“开辟新的途径,增加新的行业”^[10]的需要等等。总之,邓小平同志从包括学校建设、学科门类建设、重点大学和中小学建设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整个教育改革,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这些论断有两个极其显著的特点,一是邓小平同志不是就教育论教育,不是为教改而教改,而是从整个教育事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一思想出发来思考问题和作出决断;二是所提改革内容,看似平凡、普通,但这些方面的内容或则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内容相对立,是教育教学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或则是教育教学改革中已经或即将涌现出来的新东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予以大力支持。这为我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树立了光辉典范。邓小平同志所论列的这些方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确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改革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辉煌的成绩,从而也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这些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所以,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整个教育事业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指示和有关教改的其他指示,不仅倍感亲切,而且认为它将继续成为照亮我国经济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前进的灯塔。

(下转第122页)

不断地完善系统,蕴含了一种学习功能,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快速的系统开发方法。

三、系统模型选择要求

上面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系统模型,如何选择好的模型,除了考虑所使用的方法、工具及每种模型的特征外,还应考虑下列重要因素。

目的性:模型的选择必与建模目的相联系,首先需弄清楚系统的本质属性,然后决定模型的类别及决定系统最小构成要素。

精确性:模型是现实系统的替代物,必须反映系统的本质,且有足够的精度。失真太大就失去了模型的意义。另一方面,模型高于实际,必须去掉一些非本质的细节,否则难于控制,同样失去模型的意义。

完整性:模型应具有完整性和一致性。它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完整地描述系统。

简明性:模型应简单明了,在不失去精度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单,使得模型的构造和应用都是经济的。模型的简明性与精确性之间是一对矛盾,需恰当处理,这是模型化的主要难点。

以上所讨论的问题对于系统工程人员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恰当地选择和运用各种模型与方法,是系统成功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不是万能的,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只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归宿。它只有恰当地运用模型,模型技术才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 ① 何克清、刘晨:《计算机软件工程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② V. J. HALL, J. W. MOSEVICH, INFORMATION SYSTEMS ANALYSIS, 1988.

(责任编辑 江 平)

(上接第 99 页)

注 释:

- ① 《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1 页。
- ②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9 月 21 日)》,转引自《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3 页。
- ③ 《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13 页。
- ④ 薄一波:《在学习邓小平有关论述座谈会上讲话》,《文汇报》1994 年 2 月 4 日。
- 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 年 4 月 22 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1、104—105 页。
- ⑭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 页。
- ⑮ 邓小平:《教育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5 页。

(责任编辑 江 平)